

前言

人到老年宛如回到儿时，思想上有一种解脱感，行为上就难免消沉避世。善言辞的人说这是恬淡静默。我不善言辞，只是觉得这一生经历过的事情很多，能在晚年享受儿女成人、孙辈绕膝、学生盈门之乐，是一种难得的满足。人年轻时常将满足视为不思进取和安于现状，并认为这是消极。现在看，晚年有些满足感使我心气平和，安然处世，尽量不给子女、学生、单位和社会增加过多负担。我想这也是人到老年时的德行实践吧。

但人世间事，有欲罢不能者。1997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年轻学者林在勇教授为浙江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学述”，其意甚殷、礼甚恭而索稿实甚急。我定力未深，心有所动；在座的庄孔韶教授又劝进不止，于是就在半推半就中从了命，自我解嘲说这也是为学科和社会尽点职责。但以我年事之高，哪里还有下笔千言之力？何况家人子女都自有工作，无暇为我记述。

好在身边学生较多，为人也还厚道。他们听说我有此急事，纷纷援手相助。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庄孔韶教

授安排下，校内外六七个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加上我的家人，在百忙中组成一个小班子，帮我寻找材料，提供线索，并分头对我进行访谈记述。就这样搭起了这本书的架子。为感激他们的盛情，兹将帮助收集各章资料并执笔记述的学生姓名列下：

第一章：潘守永，讲师，博士候选人

第二章：庄孔韶，教授，博士

第三章：潘蛟，副教授，博士候选人

第四章 胡鸿保 副教授 博士

第五章：杨圣敏，教授，博士

第六章 陈长平 副教授 博士候选人

第七章：王建民，教授，博士

上列记述者中，除胡鸿保博士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外，其余都是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事。

我的多年同事和老友陈永龄教授阅读初稿后，劳动八旬之躯，命笔写下一篇记述。年轻人都说可以用这篇文章作为本书序言。但陈教授特别讲究燕京大学的传统，那就是只有教师为学生作序而不能反过来。他这样坚持，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再委屈他一次，把这篇文章作为附记。从事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民族学系教授王建民博士帮我对材料进行统编并补充了重要资料。在此基础上，我对全书进行了总体的编校。编校过程中，我的学生张海洋博士曾经多方协调，出力亦多。我对所有人的工作感到满意，并对他们深致谢忱。华东师

范大学林在勇教授策划选题，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多方提供方便，使本书终得面世，我也借此机会表示感谢。

通过这本书，我希望读者能对一个走过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民族学 / 人类学者的学术生涯了解一个轮廓，存下一份回忆。也许它能勾起人们对本世纪中国民族学 / 人类学发展历程的一些思索，并对这门学科在不同社会场景下与时局的磨合有个评说。当然，我的“学述”只能是整个学科发展的一个侧面。学科的广博和隽永更体现在广大同仁不懈的努力之中。更何况撰写学述应是 70 岁左右当为之事。1930 年出生的人现在正当其时，而我却是 1910 年生的人。所以，尽管有这么多同事、学生和家人鼎力相助，尽管他们多是本专业的才俊之士，但因九十来年的人生有跌宕起伏，国事有沧桑之变，加之我本人年老，记性不佳，无力把写作和资料严格统筹。书中涉及的人、事和年代也难以一一搞准。这一切不尽人意之处，应该由我承担全责。我还要向书中该提而没有提到的师、亲、友朋表示歉意，并恳请编辑和读者见谅。

九旬叟林耀华

1998 年 3 月 30 日

识于中央民族大学

严复研究：初上治学之路

我们这辈知识人，多在西学影响下长大。后人说我们是“中西合璧”，意思是说，这辈人有些国学根底又受过西学熏陶。我本人就是这样。早年开蒙，虽是在家乡福建省上私塾，但当时私塾已经很有“中西合璧”味道。后来到福州的英华中学，再到北京的燕京大学，又到哈佛大学读研究院，一直拖着一颗中国人的脑袋在现代西学的教育体系中颠簸，接受熏陶濡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说到底也还算是西学。早年我受同乡先生严复影响，以为现代科学是救治中国的良方。后来接触鲁迅先生的作品，又感到历史文化的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总之，当时的青年与现在处境不同，一脑袋的救国思想。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氛围下，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找出中国贫弱的“病根”是很多青年人追求的目标。我就是在这种由时代和社会设定的目标引导下，于 1928 年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系。

我的早年生活情形，多已写在我的“传记式”作品《金翼》(Golden Wing)里。这书的大陆中文译本由学生庄孔韶与敝子宗成合作完成，已于 1989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此之

前 还有宋和先生翻译的台湾中文本 书名为《金翅》。细心的读者不难从这本书里面找出我童年的影子。有书为证，我本来不必再费笔墨。但想到许多人对于我为什么在当时选择了社会学道路，早期做过哪些探索，现在怎样看待自己的一生，恐怕还有兴趣而不得其解。由我本人在世纪之交把这些话题扯一扯，或许可以作为后人选择生活和治学之路的参考。所以我还是乘这个自己能动、学生帮忙、出版界不弃的机会，做个交待。至于叙述中肯定会有挂一漏万和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那都是年龄作怪，只能请编辑和读者海涵了。

我 1910 年出生在福建古田的岭尾村。现在回忆起来的是：家乡有一间读私塾的屋子。小时候，我的家境略能温饱，我本人又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得到父母偏爱，所以五六岁时就被送进去发蒙。私塾先生教我们背孔子的话，一遍又一遍 内容包括《论语》和《孔子家语》。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手里的竹板。哪个小孩背不出来，他就用竹板打手心。儒家经典里的警句，哪怕是通俗的，也不完全适于儿童。这样死背，也许是为了长大之后的潜移默化吧。我现在也承认儒学的道理深刻，但对我来说，其实是后来靠了许多实际生活的经验才理解的。当时从小学到中学，中国古典文论诗歌学了一些，又深深地卷入了日常的民俗生活，耳濡目染。这些就算是我在走上学者生涯之前奠定的知识基础了。

1928 年我进入燕京大学，是因为受了在外读书见过世面的大哥林升华的影响。当然，里面也有我作为年轻人企

盼远离家乡，增广阅历的动机。那时交通不便，从福建到北平（今北京），先是乘船，再乘海轮，最后搭乘火车才能到达，可谓费尽周折。当时的路途也不太平，常有土匪截道，如《金翼》里所写的小哥与同学在上学路上被土匪绑票的事，今天的青年人难以想象，以为是小说笔法，其实那都是亲身经历。当年中国山区的情形就是那样。总之，当时人求学很不容易，要冒风险。好在我生在乡下，吃得了苦，走出了这一步。现在跟孩子们开玩笑，我说这家里就我一个乡下人。孩子们也乐于承认先有乡村后有城市的道理。接下来就说我这个乡里人是他们这些城里人的衣食父母了。对学生们我也常讲，年轻时不要怕吃苦，心里要有目标和理想。燕京大学就是我当时求学的目标和理想。至于进社会学系则是“推拉”作用使然。推我的是好奇心，拉我的则是这个系的影响力。我的老同学费孝通说，他是1930年转学到燕大时才知道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费孝通，1983）我入学的情况与他不同，但跟他一样，入学伊始时我对社会学也一窍不通。至于我后来能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里有所贡献，那全应该归功于吴文藻等老师的栽培，归功于燕京大学和以后的哈佛大学的培养和教育。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于1922年。社会学在燕大单独建系的动议，首先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驻华同学会的步济时（J. S. Burgess）、甘博（S. D. Gamble）、甘霖格（L. Sweet）、爱德华兹（D. W. Edwards）诸位先生提出。他们认为社会服务事业非一方面可进行，要顾及整个社会，故应成立专门的学系。1925年，该系名称又改

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1926年，燕京大学增设研究院，开始培养研究生，正是日盛一日的时候。我1928年到燕大时，社会学系开出的课程基本上分成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两支。理论社会学课程分三类，（甲）普通社会学、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社会人类学；（乙）人口、家庭、地方社会组织、领袖、集合行为、中国社会变迁、社会运动自然史、乡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丙）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思想史、高级社会人类学、当代社会学说等等。应用社会学的范围主要在社会控制方面，强调大转型时期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既把中国问题当作整个世界问题的一部分，又看到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与独特性。当时社会学关注的热点有平民教育运动、农村运动、社会实验运动以及各种政党和文化运动等等。社会学系的培养目标一是理论研究人才，一是社会工作人员。我对这门学科的理论和应用两方面都很感兴趣，各门功课都学得很认真，成绩也不错。毕业时，我获得了当时作为对优秀毕业生鼓励的“裴陶裴奖”。这在当时是一项很重要的奖励。获得裴陶裴奖的条件简单而生硬，那就是要求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的各门功课成绩全优。这样到毕业时，获奖人自然脱颖而出。得了这个奖，出国留学就很便利了。

读大学时，我个人的训练主要在理论方面。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有吴文藻、许仕廉、杨开道、甘霖格，后来还有到中国讲学的派克（Robert E. Park）、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Brown）等，都是一代宗师。回首往事，我的社会学知识主要是在燕大读社会学系时打下的基础。最初，燕京

大学社会学系的课程，和当时中国其他教会办的大学一样，主要用英语讲授，用的也多是外国教本。这就出现了怎样把这些外国知识变成中国学术的问题，或者说是学科中国化的问题。

燕大诸师长中给我恩惠最多、对我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吴文藻先生。他不仅在学术上帮我教我，而且授我以为师和待人之道。这一切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事实上，我在垂老之年身边能有这么多学生帮忙，从年届八旬的陈永龄教授到而立之年的晚辈们都肯对我推心置腹，都可以说是吴师门下的遗泽所致。每次看到这些学生来访，我就想起吴师和冰心师母在燕京大学的家中接待我们的那其乐融融的情景。至于燕大同学，现在头脑中印象最深的是费孝通、瞿同祖和黄迪三个。这是因为我们不仅同学，而且同年都是 1910 年生，都属狗。后来大家都学有所成。师母谢冰心高兴时又喜欢开玩笑，所以圈子里的人就有了“吴门四犬”之说。

经过四年的学习，我要毕业的时候，选了“严复研究”这个题目。今天许多人会感到惊讶，感到“严复研究”应该是一个思想史或近代史的题目，而不像社会学系学生的研究选题。其实，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当时的燕大社会学系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为己任，除了社会现状与理论研究外，中国思想家的学术与社会思想自然也是重点内容。

严复思想研究是恩师吴文藻先生指导我做的。吴先生 1929 年回国后到燕大任教。最初，系主任许仕廉请他担任“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和“人类学”三门课程。

当时，他从美国学成归来，不久就与著名作家冰心女士结婚，在社会学系的学生中很受崇拜。能够请吴先生担任论文指导老师，也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和庆幸的事。吴先生以为研究严复的生平与学说，对于实现西方学术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有机结合很关紧要。事实上，我的前后同学中也有不少都选了以中国近代人物及其思想为对象的研究题目。例如，周振光做的是《曾国藩领袖之分析》，黄文宗做的是《孙中山之社会思想》等。类似的研究实在是当时燕大社会学系的一个特色。除了社会学系的传统外，我个人选定严复还有以下几个缘由：

(1) 严复的地位。我在学校读书时，就知道严复“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梁启超语）；“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蔡元培语）等评价。他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有极密切之关系，特别是他对西方现代科学的引进的贡献之大，有不容忽视者。

(2) 我认识到在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方面，严复曾有特别的功劳。是他系统翻译介绍了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其中包括社会学思想；是他对近代思想启蒙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他在译著中将传入之初的社会学译为“群学”或“人群学”，并将其列于“经世之学”之列。严复不仅是启蒙思想家，也是现代社会学的先驱者。研究他的社会思想与学术成就，可以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以及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历史。

(3) 我与严复是福建同乡，且一向仰慕先生的思想与学识。少小时代，受大哥及所赐书报影响，即对严先生为人

为学心向往之。在燕京大学有此机遇，我更感到研究严先生的生平与思想是责无旁贷的。

(4) 当年胡适先生曾言：“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的如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应该由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许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学生为什么不来这里得点实地训练，做点实际的史学工夫呢？是畏难吗？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吗？还是缺乏史才呢？”胡适先生这段话对我是一种很强的刺激。我在论著的序文里曾言：“今此篇之作，近承师友之赞助，远则蒙启发于胡先生焉。”这里“胡先生”指的就是当时我很景仰的胡适先生了。“师”主要指吴文藻师，“友”主要指严复先生的后人（侄孙）严群。

(5) 我与严群君是同窗好友，交往中，曾在其处获见严复先生遗著多种。他也慨然相借。后来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得查阅侯官先生未出版的著作、往来书信，甚至严氏家谱等外人不易见到的资料。主要有：《评点古文辞类纂》、《评点王临川全集》、《家书》（严氏家藏墨迹）、《论子书》、《与侄书》、《与弟观澜书》、《遗嘱》等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侯官先生的生平、社会活动、社会交往以及思想发展等等，都是非常重要而又难得的珍贵材料。

顺带说到，我与严群先生结下的深厚友谊，长达半个

世纪之久，一直保持到他 80 年代仙逝。正是与他的交往使我认识到，从事社会学、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研究，人际之间的沟通与信任十分重要。搞好这种关系，是进行研究工作的重要一步。此后 60 多年的田野工作经历，使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此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从事调查研究，我都秉承此点，把它当作一项工作原则。只有与当地人，也就是与你的研究对象搞好关系，你才能取得信任，真正“进入”他们的世界。事后看，我在从事严复研究中总结出来的这条经验，与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工作（Fieldwork）的准则不期而合。

后来研究义序宗族社会、金翼黄村和大小凉山、康北藏民、四土嘉戎以及云南和东北的民族识别，我都无不受益于这条经验。人类学是人的研究，也是为了使人的生活更为和谐美满才进行的研究。良好的人际关系正是和谐美满的开始。因此，所到之处，我都先从人际沟通开始。有了友谊和信任，剩下的工作成果就只是刻苦和时间的问题了。西方人倾向于把人际关系看成“交换”或者“互惠”关系。换言之，搞好人际关系是个手段。作为中国人，特别是步入老年后，我越发觉得不太能接受这一点。我觉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一个人过好一生至关重要。人生在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亲人、朋友和所交往者提供帮助和方便，这本身就是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如果把这当成手段，那什么才是目的？哪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目的呢？

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小社会、小社区里的平民百姓。如何摆正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我们作人类学民

族学的，往往都是有经验也有教训的。以中国学者而论，大多数人我想是抱着认识中国、振兴中国的目的来从事研究的。但其中也有功利思想浓淡的问题，也有以研究对象为友、为师，还是以他们为愚氓，因而好为人师的问题。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在人们心目中塑造出我们学科或学者的形象。如果只是学问成功，而坏掉了学科或学者的形象，那总归是不太划算的。须知人类乃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西方大国对我们颐指气使，中国读书人尚且深觉不快，更何况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人，怎么能够因为从事了“人的研究”，就自以为肩负大任，气势凌人了呢？我在晚年愿对年轻人说这些话。

好在人类学民族学不仅是研究人的学科，还是一门人类（和人类学家）进行自我反思的学科。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也开始有一种“反思人类学”。反思什么？次而言之就是反思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反思人类与环境及众生之间的关系；小而言之，就是反思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看研究者在与研究对象沟通时是否太过急功近利，导致人际关系上的短路现象。世界不是圣人组成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也难免各有所图。但作为研究者，我们是主动的一方，是我们去找研究对象而不是人家来找我们。因此，我们首先要端正态度。课题固然要完成，文章固然要写出来。但为做这些事而与其他人打交道时，我只求大家持一种安步当车的心态，从容舒缓一些，把人看得比名、利、物更重一些。我现在已经无力去跑田野了，可以回顾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自认为还算勉强过关。

前面讲过，严复研究在中国与社会学是有相关性的。接着讲材料的搜集过程。当年，受吴先生启发和社会学新流派的影响，我有意用了一点儿人类学方法。当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的出版资料，也就是严氏的译著及研究论著，然而距我写论文所要求的仍相差较远。于是我在图书馆之外另辟一条门径，通过同窗严群的关系，找到了传主的“家里”。结果，那篇学位论文除了正式出版的文献外，也用上了许多未出版的资料乃至一部分口述史料。当然，这项研究主要还是文献性的，虽然有传记性质，但与人类学的“个人生命史”方法还有差距。受知识所限，我也没有采用西方学者常用的心理分析手段。这篇论文主要是对严复社会思想的综合研究。

完成后的《严复研究》，就是我的学士学位论文，写成的时间是 1932 年。许仕廉教授是我的论文评阅人之一。他给的评价很高，更坚定了我一生读书做学问的信心。吴文藻师对我的论文也赞赏有加。次年，该文主体部分被推荐发表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的《社会学界》第七卷上。写成时的论文全文有十二章，目录约略如次：

- 第一章 时代背景
- 第二章 生平事略
- 第三章 学说渊源撮要
- 第四章 社会进化原理
- 第五章 中西社会进化之比较
- 第六章 国家进化之根本原理
- 第七章 中国社会问题

第八章 中国政治问题

第九章 中国经济问题

第十章 中国之变法图强（一）

第十一章 中国之变法图强（二）

第十二章 教育学说

向《社会学界》投稿时，我删去了第一章，篇末则增加了“严复影响”一章。发表时受篇幅所限，我又割舍了第四、第六两章以及篇末新增加的“严复影响”一章。这样，原文大约 12 万字，发表的部分约计 8 万字。题目也修改成《严复社会思想》。这倒更符合论文的内容。但那篇完整的论著从未发表过。遗憾的是，我投给《社会学界》的底稿现已不知去向，而增补的“严复影响”一章又未收入前已入燕大图书馆收藏的学位论文。这样我当时对严复影响的评述的最后一部分可能就不复存在了。现在我年纪已大，精力不济，加之时间久远，具体内容已无法追忆，更无力重新补写。人生不如意和无可奈何事本来也多，我对此倒不甚介怀。要不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索要这篇“学述”，这件事也无缘提起。

欣慰的是，学术总有薪火相传。60 多年过去，严复及近代思想的研究已结出无数硕果。严译作品多次再版，前述未刊著作及部分往来书札也早已面世。这使今天的研究条件大大改善。严复哲学思想、经济思想、翻译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均有不少成果问世，我因年轻时接触过这个题目，所以很是欣喜。权衡之下，我觉得对严先生的社会思想研究成果仍然较少，因而感到旧著仍值得在此略作简介。

当年的论文印刷技术远不普及，连机械打字机都很少

见。我们燕大学生的论文多是用毛笔逐字抄写的。在方格纸里竖行抄写蝇头小楷，那工夫得益于早年的国学。我的论文原件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热心的学生曾帮我复印一份存在家中。闲时翻看，很为年轻时居然有此能力而感叹。可惜后来经年不练，竟把这点功夫荒疏了。

年轻时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大都随着发表而流失，我也不觉可惜。唯对《严复研究》一文 我一直偏爱着 也亏得北京大学图书馆居然为我保存下来。初出茅庐的作品，自有不足之处，但也较少束缚。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让我乘机把当年讨论的几个主要方面简介一下，供查阅资料有困难的年轻学生和读者朋友们参考。

时代背景

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大师，严复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影响难以估量。然而，一种学术思想之产生，莫不有其时代背景。

盖先必有社会现象之变迁，而引起先知先觉者之思虑，于是因其时代之利弊，发为议论，而谋补救之方。思想传播、激动人心，实行之士遂相率而从事改革焉。此学术思想与社会现象互为因果之所在也。（林 1932:3）

具体到严复，

前清末叶，方古今学术递嬗之日，中西文化荟萃之秋，其思想之复杂，可以概见；然必有人焉，出而汇

万流而剂之。成此举者，侯官严几道先生是已。（林 1932:3~4）

严复之前，国人对西学的理解相当肤浅片面。概以为西学除测算、天文、测绘地图外，最重要的就是制造轮船大炮。时人以为西方之强大“只在其船坚炮利”。因此就有官僚谋办江南制造局，李善兰、华衡芳等翻译科技书的举动。当时虽然也有国际法及政治方面的少数书籍翻译，但基本上不成气候。除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官方一般人仍不相信西方有值得学习的社会思想。

1894年甲午战败，国人震动。中日水师装备不相上下且战场距中国更近，为什么中国战败？在英国学过海军技术的严复转而翻译西洋哲学及社会科学书籍，蔚成当时流行的学术。他翻译了《天演论》一书，意义很大。

（《天演论》提倡种族自强之说 尤为一般人士所乐闻，盖国人愤于中日战争之败而欲自强之道，故此种学术之来，趋者若鹜焉。……转至清末民初，国人崇尚西学而轻汉学，至是能不为叹乎？（林 1932:13）

就当时国内形势看，始自明清之际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至清末民初演成振兴民族的革命思潮。民族革命思潮强化了许多人的排外思想，国人虽佩服西方船坚炮利，而于经济学术，仍以为中国所独优。深通西学的郭嵩焘等竟被“清流舆论”万般排挤，斥为“汉奸”。现在看这种在激进民族主义驱动下的盲目排外思想，误国误民不浅。（林 1932:8~9）

又看世界局势：维也纳会议之后，发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成为反抗外来势力和正统权威的旗帜。19世纪中叶起，欧洲诸民族国家之间屡有大战，诸如克里米亚之战（1854~1856）、意大利内战（1859~1860）、普奥与丹麦之战（1864）、普奥之战（1866）、普法之战（1870~1871）、俄土之战（1877~1878）等，“莫不直接或间接受民族统一独立运动之影响”（林 1932:5）

再看学术思潮：19世纪中叶，孔德在社会哲学中提倡实证论（Positivism），认为一切学问皆可用科学之方法研究。达尔文观察生物界多年，于1859年用《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时称演化论）。赫胥黎和斯宾塞将其引申发挥，援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演成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他政治、经济、法律、历史诸学科，亦于是时大抵于成。

然此等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家、社会学家之言论，莫不以拥护军国民主主义为目标，而斯宾塞之“适者生存”一语，即直指国家之所以成立而言。军国主义者利用此种哲学，扩张军备，于是忘其自卫之本旨，而为“生存竞争”之涂术焉（林 1932:7）

这一章的结论是：西学传入后，国人对国学的轻视与误解，都强烈到很忧虑的程度。而在西方，也颇有人倡导以科学哲学（适者生存原则）为建国之基者，甚至试图不顾风俗文化历史地理差别而强求跨国统一。这种所谓的学术研究，严重玷污了学术名誉。（林 1932:4）学术固然有其“器”用，但它主要是道。一个社会若把所有学术都当作器用而